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二十一期
2023年9月　　頁3-8

「五四傳統與轉型時代之再思：紀念張灝先生專題」小引

潘　光　哲*

眾所周知，殷海光（1919-1969）先生（以下敬稱一概省略）是張灝（1937-2022）的啟蒙恩師。師徒之間，無所不談，彼此對近代中國的變遷，同感共受，可以討論的議題，廣泛之至，無怪乎為師的殷海光，向學生輩的張灝自剖心路歷程，自認是「註定了要孤獨的」"a post May-fourthian"；也自比為「冰山上的一枝小蠟燭，它掙扎著要在濃霧中發出一點微光，免得船觸了礁，免得乘客們同歸於盡」。可是，身處現實壓迫的殷海光，只能無奈地期待自己可以衝出牢籠，在異國他鄉，找到一個可以進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角落。他相信，自己可以 "free from culture-bound"，又能相當掌握行為科學及新的方法論，[1] 必然可以做出成績。當然。事與願違。殷海光不僅沒有完成「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寫作；終其一生，更沒有辦法離開臺灣這方島嶼，齎志而歿。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 殷海光：〈致張灝（1967年3月8日）〉，收於殷海光著，潘光哲編：《殷海光書信集》，見林正弘、潘光哲、簡明海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第18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270-279。

當殷海光還在為落實自己這番心願而努力的1967年，張灝已經以梁啟超（1873-1929）為題的論文，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翌年起，開始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此後在北美學術界發展的張灝，研究（廣義）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總體業績，明顯超越了恩師。

例如，較諸殷海光最重要的思想專著《中國文化的展望》（1966年初版）顯現的思想傾向，張灝的認知，無疑更為細膩。像是史學家許倬雲發表過書評，固然稱譽《中國文化的展望》是「近年來討論文化轉變的著作中的上乘作品之一」，卻有著「忽視文化的時間深度，劃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平面」的缺點。[2]

對比之下，張灝研究梁啟超的成果[3]便已指陳，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可以看成儒家經世致用傳統與尋求現代思想新方向（the contemporary search for ideological reorientation）的思想紐帶（intellectual link）。就社會理想層面而言，梁啟超既承認國家為最高群體，也把國家的道德目標轉變為集體成就和增強活力的政治目的；但是，這兩個過程是與儒家經世傳統融合在一塊的。[4]顯然，張灝的詮釋，已脫越師尊之藩籬，並不將傳統與現代視為對立分離的兩極。

---

2 參考：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頁245；其他評價述說，不一一引證。

3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Chang, *Liang Ch'i-ch'ao*, 297-298；當然，張灝批判的靶子應當是 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因為他的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9）說梁啟超在思想層面疏離中國傳統，而在情感層面依然有追戀；張灝認為 Levenson 的這個論點不言自明的假設是，梁啟超把傳統看成鐵板一塊（a monolithic entity），視為毫無分別的整體。見 Chang, *Liang Ch'i-ch'ao*, 112.

張灝非僅不將傳統與現代視為絕對對立分離的兩橛，他更進一步挑戰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重大命題：「衝擊與反（回）應」（impact-response）。那是在1950與1960年代居思想霸權地位的論說典範；[5] 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開宗明義就說：「這本書的主題是論列中國近百餘年來的社會文化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反應」。[6] 即便已出現不愜其意的論者，如研究外來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之境遇的Paul A. Cohen，就批評說，研究者過於聚焦在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的過程，以至於忽略相反的發展：中國影響與西方反應（Chinese impact and Western response）。像是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發現，他們必須面對意想不到的挫折與敵意，對這等劇烈變化的體會（或可說是憎恨），結合了對中國事務的根本不滿等等，都會嚴重地制約他們對於中國環境的回應。[7] 張灝的觀察，則假闡釋中國傳統內部的變化，以說明「衝擊與反（回）應」的多重樣態。他認為，晚清中國知識人主要承襲是從儒學傳統的一套獨特關懷與問題，從而回應西方的衝擊，那麼，傳統儒學內在面向（the inner dimension of Confucian tradition），不宜須臾忘之。[8]

在張灝看來，西方的衝擊這等認識，往往會把衝擊的對象：傳統，聯想成為沒有生命的、被動的、靜態的構造。實際上，傳統的最大特徵，乃在於它的複雜性和發展性。況且，所謂「中國傳統」

---

5 相關述論，參考：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9-55；代表作當推： Ssŭ-yü Têng [鄧嗣禹]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6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序言》，見林正弘、潘光哲、簡明海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第1卷，頁1。

7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64-265.

8 Chang, *Liang Ch'i-ch'ao*, 3.

絕對不僅限於儒家而已。就晚清時代言之，佛家以及諸子學都別有新機，持續發展變化。因此，晚清思想不只受到西方的衝擊，也受傳統的衝擊，探討兩種衝擊之間的關係，反思如何化合成為新的觀念和思潮，就是我們不能忽略的課題。[9]

張灝的關注面向，更不只限於形而上的思想層域而已。方其討論晚清思想發展的方方面面，就已經重視新的傳播媒介：新式學堂、學會與報紙的意義；[10]他稍後發表於《劍橋中國史．晚清篇》的專論：“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更有進一步的描繪；詳縝述說學會（成員）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即為一例。[11]日後，張灝更深入地營構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之命題，指陳從1895年至1925年初前後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可名之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領域方面，充分展現了突破性的巨變。[12]凡其所思，對於如何從宏觀視野理解近代中國思想觀念的變遷軌跡，確有啟益之功。

回到1950與1960年代的歷史場景，可以說，張灝的認識角度，與學界認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主流，並不合拍；卻也正是因為不迎合既存的研究典範，他的研究業績，自是別出新裁；歷經

---

9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頁477-478。

10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頁480以下。

11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900-1911, Part 2*, eds.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4-338 (esp., 332-333).

12 相關述說，可以參考：丘為君：〈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收於王汎森等著，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2007年），頁507-530。

時光汰洗，始終發人深思。[13]

世眾咸知，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裡，內藤湖南（1866-1934）的史學業績，有賴宮崎市定（1901-1995）為代表的接棒者，[14]代代相衍，起而繼之，推陳出新，「內藤史學」竟可發揚光大。在漢語學界裡，「張灝史學」同樣也應該是值得後來者細為琢磨，賡續宏揚的學術思想遺產。

《東亞觀念史集刊》創刊以來，向來重視繼承前輩學人之業績，期可厚植日後學術發展之基礎；既有之「舊文新譯」等欄目，歷歷可數。本期推出紀念張灝學思業績的小專題，其意不外乎是。專題部分文稿，除對外徵稿外，多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之「張灝院士紀念工作坊」（2022 年 8 月 31 日；包括線上與會）；發表後經過評審程序，始得刊布，以饗學林，謹此對於近代史研究所所方支持，與出席發表及評審同仁之辛勞，同致謝悃。個人承司「紀念工作坊」具體舉辦工作，匯總諸篇編務，不辭鄙陋，略述心懷；倘若一切努力，可以為開拓「張灝史學」之天地，加磚添瓦，並得到學界的支持迴響和批評指教，必將是最大的榮幸。

[13] 本篇所述，自不能指陳張灝學術思想業績之全景與貢獻，如他對於「幽暗意識」、「軸心時代」、近代中國知識人的意義危機與超越意識、乃至五四思想傾向等等議題之探討，既廣且深，自須個別詳為考察；筆者智駑，自是難可盡窺全豹，如蒙識者諒之，其幸何如。

[14] 相關述說，不詳遍舉，略可參考：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年），頁 218-250。